

救灾与救国：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澳洲华人之 中国情怀

赵令扬 杨永安

19世纪澳洲寻金热时，华人也纷纷离开家园，前往澳洲掘金。无论在任何艰辛情况下，华人从来没有忘却乡中的亲人和滋养他们成长的祖国。每当中国遭逢天灾的时候，澳洲华人即联合各地华人团体，群起救灾。1906年及1912年江苏及广东北江各地之水灾，澳洲各地善款，俱由香港东华医院转赈灾区。

1904年，日、俄两国因利益冲突而宣告开战，香港因日本为中国东邻，乃群起支持日本，对抗俄国。澳洲在昆士兰、西澳洲等地华人，也纷纷捐款，直接交付当地日本领事馆。

辛亥革命期间，澳洲华人在悉尼、墨尔本等地，大多支持革命，并筹捐军饷予革命军，其中以广东中山县人最为活跃，因孙中山乃中山人之故也。

九一八事变，澳洲华人更高调抗日，支持国军。除汇款回国外，也有华人回国参军，效忠祖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旅居澳洲不同党派、不同政见及不同籍贯的华人，也都摒弃成见，团结抗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海外华人更踊跃支持国家所发行之公债，倾力以赴，力敌外侮。

19世纪以来，旅居澳洲华人在各省不但能够发展所长，且能加强祖国和旅居国之关系，经年累月的变迁，今天中国和澳洲两国友好之关系，应是旅居当地华人努力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前，由于澳大利亚自我保护政策的驱使，导致不少华工不能在该地区谋生，又或者未能通过白澳政策（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下所订立的英语测试，他们都在无可奈何之中，陆续返回国内，或转往其他国家一碰运气⁽¹⁾。至于早在澳大利亚境内工作，甚至定居的华人，也有很多因白澳主义的扩张，感受到寄人篱下非长久之计的苦恼；他们当中部分已在澳大利亚各州（省）居停了一段颇长的时间，因着经营唐人土铺（什货店）、果栏、酒楼食肆而致富，随着国事日坏，他们亦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态，变卖了彼邦的生意而重返故土⁽²⁾。这样，本来一度成为华人实践寻金梦与讨生活的新金山⁽³⁾，因着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驱使，华人人数量急剧锐减⁽⁴⁾。不过，当年僻处南天异域的“少数”中国人，却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自何方，他们时刻心系家园，响应着那来自远方祖国的呼唤，并伸出同情之手去捐救因各种灾害而陷于水深火热，甚至丧失性命财产的同胞。

清朝末年，国家积弱不振，不独在国际军事、外交上都处于劣势，领地更被列强瓜分，而中国内部也因各种天灾关系，以致哀鸿遍地，百姓流离失所。1902年广东省城广仁善堂因两粤旱灾日甚，急电澳大利亚雪梨（即悉尼 Sydney）以联益堂为首的华人福利团体，呼吁尽力劝捐⁽⁵⁾。当时，悉尼的华人多来自广东中山、高要、四邑、东莞等地，所以一声义捐，群起响应。各大华人福利机构都纠合乡里，筹措善款，只合盛堂一家，即筹捐105镑、联益堂亦筹捐25镑⁽⁶⁾；在20世纪初，一个普通的菜园华工，周薪仅约英镑1镑半左右，本工周薪平均亦只有2镑~3镑⁽⁷⁾，不少花甲华工劳碌半生，终归乃是孑然一身，在垂老之际，要依靠本地同胞开设的福利机构及侨居的华人仗义帮助，才可筹足船资与旅费回国。那个时

代的物价固然与今天有一段的距离，但与当时的华工工资相比，却显得绝不便宜，如鸡蛋每打平均 8 毫，鸭蛋每打平均 9 毫，鸡每只平均 1 元 5 毫，鸭每只平均 2 元 2 毫（米价未详）等⁽⁸⁾，在这种生活迫人的情况下，义捐固由侨领、殷商带头劝捐，不少华人店号如安益利、广荣昌、新兴栈等数十间杂货铺都筹捐 3 镑以上的善款，而以个人名义捐款的亦大不乏人，这是现存资料中，最早见到的大规模义捐。是次善举共筹得 227 镑 13.5 元，都汇归省城外埠购米运回平糶，并发出米票 15 万张以上，方便贫户余米⁽⁹⁾。

1906 年，江苏各府州因春夏淫雨不止，农田皆成泽国，芦舍为汪洋所淹，寸谷不收，饥民 400 万，饿殍 800 里，上海各报章向海内外同胞呼吁赈捐，而远在澳大利亚的华民，莫不竭力捐灾⁽¹⁰⁾。1909 年，广东水灾为患，各地区如开平、恩平、鹤山、新兴、新宁、高要、高明、新会等 8 邑房屋为洪水冲塌，溺死人命无数，无食无居者不知凡几，雪梨华商思乡情切，在永安号、永生号果栏等唐人商号发起下，又再掀起救灾热潮。查该岁广东风雨连连，基围崩溃，谷物歉收，一秧未插，水灾又至，该地华人殷富者固然落力捐赈，而不少华侨、华工亦自将善款汇至香港《商报》或东华医院，再转灾区募捐中心⁽¹¹⁾。

1911 年，安徽遭受有史以来最大洪峰冲击，湖南、湖北皆被牵连，上海公电不独仅至悉尼，且远至既连弥时（Glen Innes, New South Wales），广生和号亦接获急电，恳请尽速筹赈。是次募捐行动，由既连弥时埠广生和号及利生号负责，两次募集捐款已达 130 余镑⁽¹²⁾。未几，安徽水灾辗转演变为长江泛滥，饥民死亡枕藉，四野荡没，惟见浮尸。是次较大规模的劝募行动，由悉尼帝国宪政会负责，三次捐款合共 200 余镑，均电汇上海华洋会赈会集收⁽¹³⁾。

1912 年，广东北江泛滥，英德、韶关一带俱被水淹，早稻尽没，灾民避居山上，其后又祸连东莞。是次不独悉尼华人募捐赈济，昆士兰省即布里斯班公义堂还率先发起义捐，纠集百镑左右善款汇运回粤。同年的汉口灾民捐款亦由悉尼帝国宪政会及保商会负责，筹银 80 余镑，俱付香港东华医院转赈灾区⁽¹⁴⁾。

1914~1915年，粤东地区豪雨成灾，东、西、北三江同时泛滥，损失之大，为百年所未见。因东江暴涨，东莞首当其冲被洪水吞噬，乡间桑梓呼救乏门，于是去电各地华人，请求捐赈，以济灾黎。1915年7月，悉尼东邑公义堂率先登报劝捐，广告连刊数周^[15]，掀动不少热肠古道者济世之心，善款由澳大利亚各省汇聚至悉尼，再由源泰同记及利生号等汇归中国^[16]。既而，灾区不断扩大，致令更多饥民卷入这场无休止的天劫之中。于是，救灾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东莞，而是放眼于整个广东地域，谷当（当时又名曲汤，即今昆士兰省的Cook Town）的唐人土铺义集当地以个人或公司名义的捐款，汇返香港再转至有关灾区^[17]。查1916年初广东救灾总公所覆悉尼中华商务总会公函中指出，在1915年7~8月后汇寄救灾总金额已达706英镑^[18]，而善款仍然缕缕不绝地在捐献之中。

1920年，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因长期失雨，旱情异常严重，而南面的湖南、浙江及福建等省则水灾为患，居民长期无食，转食树皮树根，食尽则食其子女，或不忍者则易子而食，可谓饿殍载途，转填沟壑。悉尼中华总商会再度发起募捐^[19]，致公堂等机构亦继而响应，一时华洋义捐北5省4000万饥民，在短短三旬之间，已筹集了2000余镑^[20]，这不独看到华人乡情的浓厚，亦看到当年澳大利亚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尽是负面地加以排斥^[21]。

澳大利亚华人除落力筹款捐灾以外，不少家乡建设的消息传来，都会踊跃助捐，其中又以乡间学堂的募捐尤为热烈，主要原因是华人抵澳以后，见识渐广，眼界日开，接触西方文化之余，了解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当1905年旅居悉尼的广东增城人士建议倡办唐美乡蒙养学堂时，立刻掀起了广泛的回响^[22]，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一共筹集了近500镑的款项，为这所小学的建筑费用及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也因着这样的缘故，1906年广东中山隆都青姜忠堡义学筹款^[23]、1907年中山沙涌马氏学堂劝捐^[24]、1920年东莞公义堂为乡间义学动捐^[25]、同年广州培正学校劝捐^[26]、1923年广东岭南农科大学教授亲至澳纽劝捐农务学堂^[27]、1930年再捐广州培正等^[28]，都驿动了华侨、华工捐资回乡

兴学的决心。此外，如 1910 年香山县城接生机构保育善会及香山隆都卫育善会的劝捐^[29]、同年新安安仁善堂西医院的兴建^[30]、1926 年东莞留医院劝捐^[31]，又或者 1918 年湖州地区修桥^[32]、1921 年中山回春养济院的设立等^[33]，都曾在澳大利亚的报章上作出呼吁，很多乡情萦曳的华人都纷纷集资应捐。

在故乡多灾，祖国多事的大时代里，我们还可观察到 19 世纪末过渡至 20 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人那种爱国的热诚，纵使他们处身在汀零南渡，重洋远涉的新世界，但每听闻国家有事，虽恨未能回国报效，而义捐名册中的行列，却往往载之不绝。由清末至民初期间，国际形势之逆转与国内政治的动荡，都需要海内外同胞的捐助来渡过重重难关。华侨在这方面充分表现出对祖国的爱护及支持，虽谓募捐名目极多，筹款活动也一浪接一浪，这都没有挫折他们重建新中国的理想。

19 世纪末年，列强借清室颛顼无能，覬覦中国各主要海港，美人名为解放大陆，实则营取私利，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及强化自己的国际地位。俄国人于 1898 年占据旅顺、大连，扬言保护两地免被日本侵吞，清政府既昧于外交，又怯于形势，即从两港撤兵，任由俄人扬旗北国。此次事件令海内外华人认清俄人的真面目，仇俄之心顿然高涨。同年，由直隶开至山西的铁路线，全权委交俄人承办，耗费银千万镑以上，当时国家财政已绌，仇俄之情方殷未艾，立时舆论大哗，认为中路益俄，海内外同胞莫不敌气同仇，惟北望兴叹之余却恨无力报复。

1904 年，日、俄两国因利益冲突白热化宣告开战，是时，举世皆以为俄军将挟雷霆之势，如狮扑兔，战事必在短期内结束。不料战幔初揭，日军即捷报频传。国人素以日本为东邻，又自诩文化影响彼邦，更以为日与俄战，主因在于替中国力争东三省，进而维持东亚和平大局，于是香港华人商会发起抚恤日本在战争中阵亡及受伤兵士的募捐，同时亦向海外同胞呼吁劝捐^[34]。

按现存资料记载，当时澳大利亚华人都激于义愤，善款源源不绝在昆士兰、西省（Western Australia）集合，或直接交付当地日

本领事，或寄至悉尼与该地捐款一并转交日本总领事。悉尼华商麦少彭（活跃于1904年前后）、吴锦堂（活跃于1904年前后）等因曾留学日本关系，更主动购买日本国债作为捐助日军军费之举，同时又向日本区的华人游说劝捐^[35]。

今天，我们生存在那历史洪流过后的后来者，固然觉得当时华侨的热情近乎愚昧，但身处在当时的同胞先辈们，既亲历祖国为列强所瓜分的事实，又避居异地为白人世界所不齿，且又确信日本与俄开战实质为替中国而战，那种错综复杂的心情，我们仍是应该体会得到的。

清朝统治者的无知，加上封疆大吏与海防官僚的无能，造成了列强对华人的轻视与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1903年6月，美国人境条例议定华人只能从华盛顿、纽约等4个指定的地方入境^[36]，这自然是限制华人，特别是华工谋生的先声。条例还强调，凡属违法越境的华人，一经逮获，不必经过审讯程序，立时解返原处。事实上，当时的华工只是工资低廉的奴隶，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每一角落。这段期间，正值中国境内觅食艰难，于是大批华工或甘愿、或被骗（俗称“卖猪仔”），都蜂拥地坐上火轮，到不同的陌生远方去从事艰辛且又危险的工作^[37]。而各大洲的苛待、虐待华工消息与美国颁布的新入境条例，促成了中国本土与世界各地华人罢买美国货的“拒美约事件”^[38]。虽然经过美国官员在1905年7月于旧金山向当地侨领解释，表示禁约只是针对文化较低下的“下流社会之人”和“中国贱工”^[39]，企图缓和华人士商的不满情绪，但全球各地华人积愤早种，一时民气汹涌，各地拒绝会纷纷成立。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自然亦感同身受，墨尔本方面率先响应。当年悉尼《东华报》载录读者来函，内容正好反映了那时代海外同胞的心声。

美利滨埠来函云：“中国抵抗美约之举，近已实行。国民团体之发达，实自此为起点。我辈居海外，饱受西人之凌辱，久已痛心疾首，欲诉无门。今得此抵制美约之事，宜如何力表同情。本埠同胞，现拟捐集款项，寄归港沪，或交善堂，或交拒约会，以赞助拒约之善举。盖此次能争胜于美人，实乃民权之转机，合群之见效，

异日有机可乘，必可与别国争衡”^[40]。

于是悉尼等地的华商相继四出活动，并亲至墨尔本联络该埠侨领，公开演说，声援华工，以争国体^[41]。是次拒约运动源于上海及香港，继而遍及中国各省^[42]，不独国内拒绝会纷告成立，国外华人聚居处如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非等地的华侨也义愤填膺，人人分派缘簿，戮力劝捐。

查美洲政府禁例，早在 1877 年始，以后逐渐强化，实在与澳大利亚的保护主义相若，唇亡齿寒，散居在新南威尔士省的华人自发地四处演说、募捐；近者如列坎（Redfern）、派罇孖打（Parramatta），远者如要拉刺（Uralla）、乌卡时（New Castle）、贪勿（当时又名贪勿、贪麻、坦勿、坦麻等，即 Tamworth）、既连弥时、乌龙江（Wollongong）等地区的华人都慷慨激昂，捐金者络绎不绝^[43]，作为支持与资助本地、中国及世界各地因罢卖美货，或身在美资公司工作因而拒约缘故，抗议辞职的人士^[44]。当年全澳各省的华人都投入是次的拒约行动之中^[45]，而乌丝纶（纽西兰 New Zealand）华侨的义捐名单，亦较日后 1915 年，由当地中华会馆劝捐粤东水灾的八期善士人数为多^[46]。

清末日蹙的国势，由来已久，惟当务之急在于巩固海防，是以建设新式船舰以抵抗列强实乃刻不容缓的变革，可惜先败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徒以为师夷之长技足可以制夷，再败于迂腐守旧保守派的阻挠，三败于西后的挪用军费，以致新舰虽成而不堪一击，败相初呈即告崩溃难修。20 世纪初的有志之士，再提重建海军旧事，呼吁国内外同胞慷慨应捐。由 1908 年至 1909 年间，澳大利亚华人对捐助中国海军反应热烈，纽西兰及飞枝（斐济群岛 Fiji）亦将捐款汇至雪梨转返中国^[47]。但光绪、慈禧的相继逝世，令在澳洲拥护维新运动的广泛支持者（帝国宪政会会员）一时却步，捐款由是逐步停止。相反而言，受到俄国大革命的启发，坚持推翻清王朝的华侨日多，尔后的捐款目标已转移到建设新中国上去。

在 1911 年革命风云涌现的前夕，支持革命、筹捐军饷补给义军的团体纷告成立，仅在悉尼一处，已有少年中国会及筹饷局等组

织。同年底，悉尼筹饷局接获胡汉民的电报，大意谓武昌举义，江南抵定，惟需军费北讨，希望澳大利亚华人落力输捐以成大业云^[48]。经此呼吁后，该地唐人店铺纷起响应，永和兴、广荣昌、广和昌、永丰号等十多间什货店都成为筹饷中心^[49]；同时，革命军既多是广东人，而国民军军政府亦在广州驻扎，革命军领袖孙中山又是广东中山人，因此广东中山向外呼吁捐饷更特别落力，在香港的中山人均集结起来向海外同胞劝捐；其中我们较熟悉的，是真光公司、永生公司、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后两者还是在悉尼以经营果栏起家的^[50]。由1911年底至1912年中，只悉尼一地已筹得4500镑。筹饷当局本意在1912年6月底停止认捐，但华民反应热烈，在欲罢不能的情况下，再展期1个月，复进赈600镑，可见革命风潮，确是人心所向^[51]。至于其他各省，例如域多利（即维多利亚省 Victoria）墨尔本国民捐总机关（在悉尼的则称为筹饷局），由1912年至1913年间，募捐14次，共收24000余镑。这笔款项由全澳各地汇寄至墨尔本总部，由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黄荣良（活跃于1911年前后）监察下，付运回中央政府财政部核收。^[52]

当国民募捐暂告一段落，中国财政部颁发各批国民捐奖状的同时，澳洲华人又再投身踊跃救国，认购公债的行列之中。昆士兰、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塔斯曼尼亚省等省的华侨都热血澎湃，争先认购^[53]。

1918年，澳大利亚限制华工人境新例颁布，华人愤慨于曾替澳大利亚开拓疆土，最终却反而被白人所歧视，于是，由悉尼华侨首倡的维持禁例会应时而生。该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与政府力争，恳请豁免苛例，使后来的华工可寻生计，而既来的华工亦可免被遣返。平情而论，华侨亦深知禁例一旦施行，不独华工从此绝迹，而居住在澳洲的侨胞亦将不能幸免。在切肤之痛的关头，各省华侨在接获知会后即群起响应，昆省以农业为重，反应尤烈，当地不少唐人商号如芝和堂、新和泰、合昌、三盛、和生昌、永安隆等，都成为筹款中心，华人涓滴输助，解囊义捐，又再一次掀起募捐的热潮^[54]。

民国初立，根基飘摇，孙、袁位出文武，畛域迳分南北。孙中

山先生为存大局，慨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岂料袁氏谋复帝制，破坏共和，而猝死于忧愤交杂。继者如张勋复辟，军阀乘势邀功，以致武人跋扈，裂地而王，一统之日翘首无期，南北虽谓义和数载，惟终一事无成而归于决裂之局，南军决议北伐以完成共和理想；消息南来，立时人心振奋，华侨救国筹款局纷告组成，各省义捐不绝于缕，悉尼筹款局更派员前赴新加坡等地劝捐^[55]。这时，不独全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争先捐献，而且更激发了不少沉默已久，却又焦急于国情的热血分子，他们都把心中的愤懑与救国的热诚，控诉于雪片飞来的读者书函之中，也有赋诗以壮北伐行色的，如：

送客悠悠复故洲，江上一望黯然愁。

相交友善同人爱，保此共和壮士谋。

延蔓草除清已没，自由花放水无忧。

中原现象今多事，年少英雄望运筹。^[56]

这些诗作大多没有什么文学技巧，却充分表现海外华人对国家的关心与能否达成一统的焦虑^[57]。总的来说，旅居异地的侨民都希望粤、桂、滇、黔、赣的联军能慷慨请缨，以西南澎湃的士气一扫北廷十年来的积秽^[58]。是次募捐范围极广，可惜我们找不到澳大利亚境内的实际捐款数字，而根据中国中央筹饷局的报告，截至1922年初为止，该局已筹集数十万元云^[59]。

既而，北伐以后，中国的内争仍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日本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1931年相继地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与“柳条湖事件”，至九一八事变的突起，令海内外同胞同时惊觉，悉尼中华总商会特别致电国内，速请平息内争，以抗外侮^[60]，同时亦决罢办“劣货”入口，立即知会香港方面排挤日本货的决定^[61]，而华侨对日救国后援会的成立及其宣言也显示了澳大利亚华人热血沸腾的一面^[62]。当时，中国的武器装备固远远落后于日本，而东北沦陷以后，逃难南下的灾民也亟待救济，于是筹款救国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悉尼有关机构如致公堂、中华总商会、洪福堂、励志会、联义堂、四邑会馆等除举行激励人心、毋忘国耻的沈阳失陷纪念会外^[63]，更发起救国捐款运

动^[64]，当东北义勇军迭败日军的消息传来时，华侨无不振奋，墨尔本中华公会一方面致电祝贺，同时又特汇犒金 500 镑劳军^[65]。然而杯水车薪，纵使个人毁家执义，也难济东北三千万众之贫，自《东华报》于 1932 年底刊登了由辽沈大前方军士执笔亲写的《东北义军之一纸血泪书》后^[66]，使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明了到前线的实况，所谓：“边地苦寒，冰天雪窖，无衣何以御寒？战事凶危，弹雨枪林，肉搏奚堪持久？”^[67]说明纵使东北义勇军矢志报国，但无衣乏食，虽能呈一时忠勇，亦难抗日人火炮战车的围攻^[68]。这段报道公开后，令华侨了解国军的胜利仅属偶然，收复失地的欢欣也只是短暂的，要维持这可贵的果实，就必须作出长期的支援与抗争，而 1932 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也使国民更清楚地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并非只在吞并东北，在他们移师南下后，整个江南，甚至岭南地区也将卷入漫天的烽火之中。这时，旅居澳大利亚的不同党派、不同政见与不同籍贯的华人，都摒弃成见，向着挽救国家民族的崎岖道路上奋力迈进。1933 年 2 月，悉尼华侨抗日救国会提出常年义捐宣言与办法，即每人自愿以自己的收入百分比，于每月月底捐献国家作为接济东北义勇军与救助战时难胞的经费^[69]。该年 3 月，从东北难民救济会的致谢函中，我们得悉截至 1932 年底，新南威尔士省捐助的 231 英镑已汇抵东北，而救国的捐款仍不断地在筹集之中^[70]。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展开，在国弱民贫的形势下，向海外侨民招手劝捐也是无奈中的一个办法。1937 年 11 月下旬，《民国报》展开了“公债宣传周”活动，所推出的国家公债，分万元、千元、百元、50 元、10 元、5 元 6 种，凡个人及团体以现金或任何有价物品均可购买^[71]。为了鼓励同胞购买救国公债，又订下了购买一定数额的分等奖励办法，如分发勋章、褒奖令及匾额等等^[72]。可惜的是在第二次欧战战火燃起后，澳大利亚政府不独严禁海路船只与消息的往返，境内的外文报章亦一盖勒令停刊，旨在禁止情报的渗入和外泄，使我们一如当年滞留在各省而又焦急无助的华人一样，慨叹山河阻绝，鱼雁不通^[73]。

转瞬一叶事，悠悠百载情。20 世纪初华人为救国扶危所做的

努力，已成为世纪末的蓦然回顾。其中最令我们惊异的，是在 100 年前居于澳大利亚华侨的数目远较想像为多，1912 年黄荣良总领事宣布，侨居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共 25000 人，其中还未计算无数的偷渡入境者在内^[74]。只在新省一地，1902 年时华人总数已在 10000 以上（按 1901 年澳洲人口调查，新省总人口为 1362232），其分布之广，又遍及南北西东。这批为数不少的早期华民，凭着坚毅不屈的魄力，或自设生计，或为人庸工，但在他们滴尽血汗来开拓新领域的背后，仍系念着一缕不灭的乡情，这些都可从他们为家乡奔走、筹募等事例中感受得到。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察觉华人地域观念的浓厚，其他省份的灾荒募捐，始终不及广东水旱的号召，这亦足证当年澳大利亚的华侨以广东人居多^[75]。

1910 年以后，捐资赈灾的款项渐少，这不代表华人对家乡灾害的频仍已感麻木，而是他们体会到国家民族整体的重要，超过故乡之所需，就他们昔年大部分人微薄的收入而言，惟含泪舍弃故乡梓里而慨然捐献国家一途而已。关于这点，我们处身百年以后的后来者，虽然没有机会，或者说，有幸没有这机会去经历那时代的辛酸，只有从一叶黄纸中，再去履耕先辈们百感交错的心田，纵而向那流逝不再的时空，默然致敬。

后记：由于当年澳大利亚官方及华人对地名没有一套一致认可的译名标准，华人往往只在英语的基础上随意把地名音译，却没有附录原名，致令同一地区或街道，往往有不同的名称，造成后来研究工作的不便。因此，本文在不同名称的中译街名、地区后都附上英语正名，并尽量注录当时不同的中译称号，以便鉴证。

参考文献

[1] 自 19 世纪中叶，澳大利亚的劳工市场向海外开放以后，来自中国的

苦力、牧羊人等都被招募至澳大利亚各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后来更多的华人投身掘金的行列之中，令华人在澳的人数日渐增加。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既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黄种人数的激增，于是各省政府均纷纷立例来限制华人入境的条件。1861年，新南威尔士的省政府通过规范与限制华人入境的法案（“An Act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Public Statutes of N.S.W., 1852 ~ 1862, 16。Vict. - 25, Vict.No.3, Sydney Govt.Press, 1881.pp.3396 ~ 3398）。中间虽然经过争议后，在1867年重新修订（“An Act to repeal the Act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Public Statutes of N.S.W., 1862 ~ 1874, 26。Vict. - 38, Vict.8&9.Sydney Govt.Press, 1881, p.3864），但最终仍是以压抑华人入境作为指标。1881年，当各省代表在悉尼讨论华人问题时，甚至有代表反对西澳洲政府在本区内以公路引入华工的建议。在同年的新南威尔士省立法机关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地政府对华人的监察态度及对这些异族外国人（Aliens）确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成见。1888年，各州代表在悉尼又展开专门讨论华人问题的特别会议，内容也是围绕怎样加强对华人入境的限制，虽然议程上附上当时各埠侨领的陈情表，却也改变不了那既定的议案（“A Bill-For the Restriction of Chinese Immigration”，见 Conference on Chinese Question, Journal of the N.S.W.Parliament-Legislative Council 1887 ~ 1888, Sydney Govt.Press, 1888, pp.1 ~ 15）。在1890年，维多利亚省继新州后，通过限制华人入境的法案，它甚至将当时第二三代土生的华人仍列作外国人看待（见“Chinese Act” in “Victoria Parliament Statutes-Trade, Customs and Marine Law”，Victorian Customs Handbook and Importers'Guide, H.N.P.Wollaston, 1892, pp.271 ~ 280）。有关上世纪华人移居澳洲问题，可参 Arthur R.Butterworth: *The Immigration of coloured races into British colonies*, London, Rivingtons, 1898。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民间舆论及多数省代表的压力下，通过了所有人士入境须要经过海关官员主考的50字欧语（英语为主）笔试法案。在当时非英语体系的亚洲入境工作者中，以中国人占大多数，其中包括菜园园工、苦力、厨役、侍应、洗衣工人、木工、漆工、商人、商人随从及学生等，而除了少数在澳大利亚居住而又经常往返的商人外，几乎全部都是不可能通过英语测试的，因此，这条法案明显就是针对华人而设的苛例。法案亦订明任何船只若运载非法入境者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话，船主将面临每一非法入境

者判罚 100 英镑的处分。这样，既一方面杜绝偷渡入境（当时称为“私位”）的黑方劳工，另一方面则正面堵截了循正途而来却又不通晓英语的华人，企图借此限制境内华人的数目。因此，不少华工都因为苛例通过后，被澳大利亚海关官员刁难而被迫遣返中国，或在回程时转往东南亚地区谋生。

- [2] 在白澳政策盛行的年代，澳大利亚政府长期禁止华人女性入境，目的在压抑过多的纯种华人（full Chinese）在国内殖根，根据当时官方的统计，1901 年澳大利亚境内的纯中国男性为 29153 人，纯中国女性只有 474 人（见 C.Y.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2）；1902 年时，居住在新南威尔士省的中国男性为 10063 人，而中国女性为 156 人，至于华父西母的混血儿（当时称为“半唐番” Chinese half castes）则有 1044 人（见 Census of N.S.W., 1901, *Journal of the N.S.W. Parliament Legislative Council, 1901*, Sydney: Sydney Govt. Press, 1902, vol.64, pt.2, p.1190）。正如前述，不少华人以粗工身份抵澳，语言不通，不易与白种女子结婚，他们的妻儿多留居中国，因而在累积了一定的储蓄后，又或者因应着中国时局的变化，他们都会回乡省亲，甚至从此离开澳大利亚，不再留恋这块讨活较易却又遭人歧视的土地。
- [3] 在 1890 年前后，澳大利亚境内的金矿多已掘罄，不少华人淘金者，又或者在矿区附近经营小买卖、建造临时房屋营帐、负责运输等工人都失去了依靠，不少人为了继续挣扎下去，转而重操乡间故业，成为各省内的种植者与垦荒者——菜园园工。事实上，当年的华人多散居在乡郊地区，从事采矿及耕种的工作，而住在市区的仅属少数（见 C.Y.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Table 2.3, “Chinese popul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1861~1901”, p.28）。就以新南威尔士省为例，居住在城市及百人以上村庄的华人人数仅有 1374 人，其中只有 1 名女性；而散落在乡郊的则有 11607 人，其中亦只有 1 名女性。能够集结百十华人，甚至数百人以上的地方，几乎都是金矿的所在地，如 200 余人聚在 Armidale 以北的矿坑，400 余人住在 New England 的矿坑附近，Tamworth 的矿坑也有着相同的人数，Lachlan 及 Binalong 各聚结了 500 华工在矿区寻找运气。仅剩下百余华人的矿坑，金矿早被白人淘金者采得七七八八，而生活穷困且又不惧艰辛的华人，却往往在这些已弃置的矿坑中掘到金矿，白人多称这是“Chinamans’ Luck”，殊不知这都是华工苦于环境的困迫，一勇向前

的结果。屯集千余华人以上的矿坑，有 Bathurst、Murrumbidgee、Carcoar、Sofala、Tumut、Braidwood、Mudgee 及 Tambaroora。其中 Braidwood 和 Mudgee 有 1300 人以上，至于 Tambaroora 更多至 1600 余人（见 *Census of New South Wales 1861*, Sydney: Thomas Richards, Govt. Printer, 1862, pp.102~586），可见早期的华人超过 7 成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依赖开采金矿为生。但在金矿数量日减之下，华工转业的情况也愈见明显，1891~1901 年间，菜园园工已取代了矿工，成为华人从事的热门行业。在 1901 年，新南威尔士省的菜园园工有 3564 人，而矿工只有 1019 人。维多利亚省的园工有 2022 人，矿工只有 1296 人。至于昆士兰省的园工有 2446 人，矿工仅有 657 人（见 C. 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Table 2.4, “Number of Chinese males in 14 major Chinese occupations, for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and Queensland, 1891 and 1901”, p.30）。

- [4] 由 1875 年开始，华人的入境人数几乎在直线上升。1875 年抵澳华人为 625 人，1879 年时已增至 1979 人，次年激增至 2942 人，1881 年更暴增至 4465 人。至于华人申请归化而被新南威尔士省政府接纳的个案也逐步增加。在 1857 年以前，我们找不到有任何华人归化纪录，自 1857 年开始，虽断续地每年也有三数归化的记载，却总不及 1882 年时的 93 人、1883 年的 301 人和 1884 年的 265 人，由 1857~1887 的 30 年里，华侨归化的总数为 899 人（“The Chinese-Number of certificates of Naturalization granted to, since the year 1850, inclusive”, *N. S. W. Parliament Statutes 1887~1888*, Sydney Govt. Press, 1889, p. [3d] c137）。这些累积的数据，正是直接导致 19 世纪 80 年代，澳大利亚各州政府立例限制华人入境的原因。有关华人在当时入境的纪录，可参见“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Statistics, 1884, “population”, *Journal of the N. S. W. Parliament-Legislative Council, 1884*, Sydney Govt. Press, 1885, vol.39, Part 2, pp.4, 38~71。同书，1885, Sydney: Sydney Govt. Press 1885~1886, vol.40, Part 4, pp.4~57。同书，1886, Sydney: Sydney Govt. Press, 1887, vol.42, Pt.3, pp.4, 20~21。同书，1887, Sydney: Sydney Govt. Press, 1887~1888, vol.43, Pt.4, pp.2, 13。但在禁限条例实施以后，留澳的华人人数由平均 3 万余人渐次下降，虽然每年均有华人抵澳，但离境者较入境的为多，至 1901 年时，澳大利亚境内华人人数已不足 3 万。1911 年，华人递减至 22000 余，1921 年更跌至 17000 左右。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国内动乱不安，华人极欲返国安顿家眷的缘

故，1933年时留澳的华人人口降至10846的历史新低，而战后（1947）更仅得9144人（见C.Y.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Table 3.1, “Number of full-Chinese by sex, various Censuses, 1901~1947”, p.42）。

- [5] 《中国饥荒来电劝捐赈济条》，见《广益华报》（澳大利亚·悉尼）1902年11月15日，第2页。
- [6] 见《广益华报》1902年11月15日，第2页。
- [7] 在1910年前后，一个熟手木工周薪最低约为3镑12元，见《广益华报》1910年8月6日，第6页，《口尚乳臭》条。
- [8] 参见《广益华报》1896年7月3日，第7页，《街市行情》条；1897年1月15日，第7页，《雪梨正埠街市行情》条；1913年9月6日，第7页，《雪梨正埠街市行情》条；1913年10月11日，增附页，《昨礼拜什货市情略列》条。
- [9] 见《广益华报》1903年1月3日，第2页，《联益善事》条、《两粤广仁善堂》条。
- [10] 见《广益华报》1907年7月27日，第3页，《联善商事》条。
- [11] 见《广益华报》1909年11月27日，第4页，《鹤山风灾》、《新兴风灾水灾》、《宁邑风水为灾》及《风雨伤人》诸条，并参第5页，《启城风灾》条；1909年12月18日，第2页，《永安县水灾惨状》条。
- [12] 见《东华报》（澳大利亚·悉尼）1911年9月16日，第2页，《长江水灾记》条；9月23日，第7页，《总领事劝赈安徽两湖等省水灾启》、《筹赈安徽两湖等省水灾》及《长江水灾捐款名单》等条；又同年9月30日，第2页，《安徽水灾又志》条。
- [13] 见《东华报》1911年9月23日，第2页，《长江水灾捐款名单》及9月30日，增附第5页《长江水灾捐款名单》条。
- [14] 见《广益华报》1912年8月10日，第5页，《坤士兰庇里时畔埠东莞捐水灾芳名》条，8月17日，增附页，《布告广东北江灾情》；又《东华报》同年4月13日，第7页，《救济汉口灾民捐款纪事》条。
- [15] 见《东华报》1915年7月31日，第7页，《东莞水灾劝捐广告》。
- [16] 查源泰同记位于悉尼钦布炉街（Campell St.）56号，专营苏杭丝发、药材各种唐番货品，并代华人汇寄信件、钱款返回中国（见《东华报》1902年10月4日，第3页，《源泰同记广告》条）。至于利生号亦座于矜步街（Campell St.）28A（当时华人都称该处一带为“希结”，即Haymarket），利生号是典型的唐人土铺，与不少华人土铺一样，也兼办寄函、款回国的生意（见《东华报》1904年6月11日，

增附页，《利生号广告》条）。

- [17] 是时，汇款由 Cook Town 方面的唐人铺直接寄抵香港，由香港的唐人铺广泰源转交东华医院（见《东华报》1915年10月16日，第7页）。
- [18] 该笔款项共706镑，折合当时港币7822.83元（见《东华报》1916年1月15日，第7页，《广东救灾公所覆乌修威中华商会公函》）。
- [19] 见《东华报》1920年10月16日，第7页，《中国灾民之危险》；10月23日，第7页，《魏总领事续募赈济灾民捐款芳名》、《雪梨致公总堂赈灾捐款芳名》等条。
- [20] 见《东华报》1920年12月18日，第6页，《北京外交部致雪梨中华总商会函》。
- [21] 略见《东华报》1920年10月23日，第8页，《赈灾录——筹赈国内水旱荒灾劝捐小启》。事实上，不少洋人在西报上看到其他有关中国内地灾情的报道时，都往往主动参与义捐的行列。
- [22] 见《东华报》1905年6月17日，增附页，《旅雪梨埠增城同乡倡办唐美乡蒙养学堂缘起》条。
- [23] 见《东华报》1906年1月6日，第6页，《香山隆都青姜忠堡义学初次捐款》条。
- [24] 见《东华报》1907年5月4日，第8页，《旅澳洲募捐沙涌马氏学生经费数列》条。
- [25] 见《东华报》1920年7月17日，第7页，《东莞公义堂捐义学小启》条。
- [26] 见《东华报》1920年8月14日，第7页，《雪梨华侨捐助广州培正学校》条。
- [27] 见《东华报》1923年8月4日，第7页，《鍾宝旋启事》条。
- [28] 见《东华报》1930年6月7日，第5页，《再续培正学校捐款芳名》条。
- [29] 见《东华报》1910年11月5日，第7页，《卫育善会劝捐广告》、《保育善会劝捐广告》条。
- [30] 见《东华报》1910年12月3日，第7页，《善界劝捐》条。
- [31] 见《东华报》1926年5月29日，第7页，《告白》；1927年10月22日，第7页，《公义堂启事》及1929年4月20日，第7页，《公义堂通告》等条。
- [32] 见《广益华报》1918年12月7日，第2页，《良都湖州北台溪筑桥捐款》条。

- [33] 见《东华报》1921年4月30日，第7页，《中山回春养老院》条。
- [34] 见《东华报》1904年4月16日，增附页，《香港华商会议捐款》条。
- [35] 见《东华报》1904年4月16日，增附页，《义捐续闻》；4月23日，增附页，《捐恤日兵家属事又记》；5月14日，增附页，《记车士兜埠华人捐恤日本兵士家属事》；5月21日，增附页，《记西省普埠、扶厘文度埠华人捐恤日兵家属事》等条。
- [36] 见《东华报》1903年8月8日，第3页，《荆天棘地》条。
- [37] 见《东华报》1904年11月12日，增附页，《纪华工往非洲》；11月19日，增附页，《劝告唐山各梓里切勿往应工役以保生命》；1905年7月28日，增附页，《南非洲苛政便览稿》；8月5日，增附页，《续南非洲苛政便览稿》；8月12日，增附页，《再续南非洲苛政便览稿》等条。
- [38] 《东华报》1905年8月19日，第2页，《美国华工禁约记》条。
- [39] 《东华报》1905年8月19日，第2页，《他辅对于华人政见》条。
- [40] 见《东华报》1905年8月12日，增附页，《美利滨埠同胞捐款拒约》条。
- [41] 见《东华报》1905年8月19日，增附页，《雪梨众华商捐款拒约》；9月2日，增附页，《纪本埠华商在孖利滨演说事》等条。
- [42] 见《东华报》1905年12月2日，第2页，《美国华工禁约记》条。
- [43] 见《东华报》1905年10月7日，第6页；10月14日，第5页；10月21日，第5页；10月28日，第5页；11月4日，第5页；11月11日，第5页；11月18日，第5页；11月25日，第5页；12月2日，第5页；12月9日，第5页；12月16日，第5页；12月23日，第5页；12月30日，第5页；1906年1月6日，第5页；1月13日，第5页；1月20日，第5页；2月10日，第5页，有关《澳洲拒约》及《美国华工禁约记》的捐款名单。
- [44] 如在中国汉口的《楚报》本为美资倡办，因拒美约事件，其主笔吴研与蒋子才自动请辞，以示抗议。见《东华报》1905年8月19日，第2页，《〈楚报〉馆主笔义愤辞职》条。
- [45] 全澳各省的华人或捐百镑，或只捐1镑，都各尽所能，为远在美国的同胞声援，这显示了大义当前华人气节的一斑。
- [46] 见《广益华报》1915年9月18日，第6页；9月25日，第6页；10月2日，第6页；10月9日，第5页；10月23日，第6页；10月30日，第6页；11月6日，第6页；11月20日，第3页；《纽丝纶中华会馆水灾捐款芳名》诸条。

- [47] 见《东华报》1908年7月4日，第7页，《海军捐之踊跃》；1909年4月17日，第2页，《本馆论说——论中国振兴海军之不可缓》等条。
- [48] 参见《东华报》1911年11月27日，第8页，《筹饷广告》及《各埠同胞捐助国民军需芳名》；9月21日，第7页，《国民捐续纪》；10月12日，第7页，《美利滨国民捐》；12月21日，第7页，《国民捐汇录》等条。又《广益华报》1911年12月16日，第5页，《特电》；1912年1月13日，第3页；1月27日，第8页；2月3日，第3页；2月17日，第3页；3月2日，第3页；3月9日，第9页；3月16日，第5页；3月23日，第4页；3月30日，第6页；4月6日，第5页；4月13日，第5页；4月20日，第5页；4月27日，第5页；5月4日，第5页；5月11日，第5页；6月1日，第5页；6月8日，增附页，有关《筹饷广告》、《劝捐军饷启》等条。由该年7月20日，澳大利亚各省正式发起国民捐，至1913年5月3日为止，华侨共募捐了14次，随后各省华人又争先恐后，投身于认购国家公债的行列之中。
- [49] 见《广益华报》1912年1月13日，第3页，第1次《筹饷广告》。永和兴在矜布炉街（Campell St.）52号；广荣昌在卡士孺街（Castleigh St.）307号；广和昌在的臣街（Dixon St.）84号；永丰号则在沙息街（Sussex St.）432号，都是当时与其他数十间同时并存于悉尼市区内的唐人土铺。参见《东华报》1915年1月2日，第4页，广告版。
- [50] 永生果栏位于悉尼钦布唠街（Campell St.）20~22号，它在悉尼的历史始于1890年前后。在1899年时，永生在沙昔士街（Sussex St.）450号及柏架街（Parker St.）3号再开设两间分店，专卖蔬果之余，也兼卖糖饼、种子及各种唐番货品。见《东华新报》（澳大利亚·悉尼）1898年6月29日，第1页，广告版。后来，因业务日益发展关系，在澳集资回国，先后在香港及国内进行各种投资，创办了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一时喻亮。至于永安果栏约创业于1897年，它坐落于钦布炉街（Campell St.）24号，正店与永生果栏贴邻，在1898年前后，它又另设一分店于柏架街11号（见《东华新报》1889年11月26日，第4页，《永安果栏》广告），明显要与永生争一日之长短，迫使永生果栏在1899年时，以四分之一篇幅宣传自己的货品（见《东华新报》1899年9月27日，第3页，《永生果栏》广告），并投入了代华侨送递函、款直抵中国家门的服务。至1903年，永安

更在“坑之”（即 Up-Town）开设四所分店，使它的生意规模，几乎有超越永生果栏之势。后来他们更与其他唐人果栏合作，在飞枝自设果栏果园，进一步扩大生意范围。在悉尼发迹以后，与永生一样，永安在澳集资返国，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进行百货业、纺织业及饮食、娱乐事业等投资，彼此的大股东马氏与郭氏也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南方显赫一时的家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略参郑嘉锐、李承基等撰译《中山人在澳洲》（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一书。

- [51] 见《广益华报》1912年6月9日，增附页，《筹饷广告》；7月27日，第5页，《雪梨筹饷局捐款芳名》。又见同年8月3日，第3页，《雪梨筹饷广告》诸条。
- [52] 见《广益华报》1912年7月27日，第5页，增附页；8月10日，第5页；8月27日，第6页，增附页；9月7日，增附页；9月14日，增附页；10月5日，第4页，第6页；10月19日，增附页；11月2日，第4页；11月16日，第4页；11月30日，增附页；12月14日，第6页，增附页；12月28日，第4页，第6页；1913年2月22日，第4页；3月1日，第6页；4月12日，第6页，增附页；5月3日，第6页；5月17日，第5页，有关《美利滨国民捐总机关领事署捐款实收数目布告》诸条。
- [53] 见《东华报》1915年5月1日，第7页；6月5日，第7页；6月26日，第7页。《广益华报》1915年6月26日，第3页；7月17日，第5页，有关各地认购公债消息及名单。
- [54] 见《广益华报》1919年1月25日，增附页，《布告昆省华侨农工商三界书》条。
- [55] 见《广益华报》1921年7月9日，第4页；8月27日，第1页；9月10日，第4页；10月24日，第4页；12月17日，第3页；1922年1月21日，第7页；3月25日，第7页，有关《筹饷热》的报道。
- [56] 见《广益华报》1921年8月27日，第12页，《鸟卡时分部视词》之二。
- [57] 当时，澳大利亚的华人都各有自己的政见及理想，即以新省为例，在20世纪初以来不少支持维新的保皇分子仍然存在，他们多反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激烈做法，因而对革命党及孙中山抱有一定的成见。当清政府倾覆后，他们这批人虽被迫接受现实，但或多或少也有些孤臣孽子的心态，所以对民国政府的态度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而对孙中山的评价亦一直是以讥讽揶揄为主。当袁世凯坐上总统之位时，他们心中不禁燃闪起一瞥的亮光，自然，对于国民军的北伐，就满口的不屑起来，这些人物，以《东华新报》（即后来的《东华报》）的股东及其扈从者为主。但正因他们的这种态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暂的维新运动的推行与夭折过程中一直保持中立，由此招来在清末一力支持革命思潮的《广益华报》股东与其拥护者的不满；加上在前朝遗民的心理因素影响下，每当其他报章对《东华报》有所批评，或只是提出善意的纠正时，报章的主笔与编辑都异常敏感地认为是遭受到挑衅与迫害；20世纪初它与《广益华报》间的恩怨、20年代前后开始与官方海外喉舌的《民国报》及东南亚其他倾向国民党的报章展开漫长的笔战，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其政治立场有关。因此，我们虽说华侨义捐北伐一事，体现了华人爱国之心，但《东华报》对北伐的冷嘲热讽及对筹捐的漠不关心，甚至懒加报道，都是在这整体中的玷缺遗憾。

- [58] 见《广益华报》1921年12月10日、第6页，《粤桂滇黔赣军之脚的一致问题》条。
- [59] 见《广益华报》1922年3月25日，第7页，《中央筹餉局来函》条。
- [60] 见《东华报》1931年9月26日、第8页，《鸟修威中华总商会电请息争御日》条。
- [61] 见《东华报》1941年10月10日，第8页，《总商会议决抵制劣货》条。
- [62] 见《东华报》1941年10月10日，第8页，《澳洲雪梨华侨对日救国后援会宣言》条。
- [63] 见《东华报》1932年9月17日、第6页，《六社团举行沈阳失陷国耻纪念会启事》条。
- [64] 见《东华报》1932年2月6日，第5页，《华侨对日战费筹备会开始募捐》条。
- [65] 见《东华报》1932年11月12日，第6页，《美利滨中华公会致东北义勇军电》条。
- [66] 见《东华报》1932年12月3日，第6页。
- [67] 见《东华报》1932年12月3日，第6页。
- [68] 据《东华报》1933年1月21日报道，因预计日军将袭攻热河，于是派遣大刀队3万人企图阻截日军的推进（第6页，《大刀队出关杀贼》条）。
- [69] 见《东华报》1933年2月25日，第5页，《澳洲雪梨华侨抗日救国

会为提倡常年义捐宣言》条。

- [70] 见《东华报》1933年3月4日，第5页，《乌修威华侨对日筹备会汇款犒军》及《东北难民救济会函谢捐款》条。该批犒金为231镑5先令，折合当时合成银2713两2钱3分。
- [71] 见《民国报》（澳大利亚·悉尼）1937年11月27日，第8页，《公债宣传周》条。
- [72] 见《民国报》1937年12月11日，第4页，《购募救国公债分等奖励办法》条。
- [73] 有关当时澳洲的中文报章概况，可略参 Lowenthal, Rudolf（罗文达）：*The Chinese Press In Australia*（出版地缺，1936）。
- [74] 见《广益华报》1912年7月13日，第4页，《敬拟澳洲国民捐章程总领事黄荣良未定稿》及《东华报》1912年12月28日，第7页，《澳洲华侨之递减》等条。
- [75] 我们从《广益华报》及《东华新报》这两份报章的取名来进行评估，便很容易知悉它们都是“广”、“东”人创办的。事实上，在《广益华报》1902年7月12日的报道中，也直指《广》、《东》二报均为广东人所创办（见第3页，《〈东华〉止末》条）；从而各福利团体的诞生，如高要、高明人士的洪福堂、四邑会馆、东莞公义堂，中山隆都同善堂、东（莞）增（城）联义堂等也都是广东人的同乡会，这些足见早期澳大利亚，特别是悉尼地区的华人以广东人居多。